

YIGE SHAZI HE YIGE
SHICHANG

张嵩山 著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一个傻子 和一个市场

和

宁肯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
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

——德漠克里特

目 录

楔子	(1)
A 章 芜湖有个“傻子”	(4)
栖惶的小贩	(4)
炒出与众不同的货色	(9)
一个接一个升起的太阳	(16)
B 章 冲进市场的黑马	(20)
合乎逻辑的发迹	(20)
他是资本家吗?	(25)
瞧瞧那双手	(33)
总书记的专车驶过	(38)
C 章 北京吹来的暖风	(43)
两位副总理对“傻子”的关注	(44)
联营的心态透视	(49)
D 章 瓜子之战(之一)	(54)
经济风浪中的大锚	(54)
扩展,向南向北	(62)

角逐大西北	(69)
E 章 瓜子之战(之二)	(73)
生命所维系的	(74)
精武会与傻子杯足球赛	(77)
物竞天择的法则	(83)
F 章 大滑坡	(86)
百日沧桑	(87)
被告席上的傻子	(95)
1986—1987 官司年	(105)
商业与法律	(111)
G 章 傻子逮起来啦	(116)
传闻了五年的消息	(116)
并不痛苦的拘禁	(126)
傻子的女人们	(133)
伟人南巡的效应	(143)
H 章 由人评说的小贩	(149)
在才智与蒙昧的交叉点上	(149)
一个模糊的灵魂	(157)
灰色名人	(168)
I 章 瓜子城的没落	(183)
倒闭	(183)

凋零的市场·····	(194)
兴衰启示录·····	(202)

楔 子

七十年代末的中国，似乎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信仰困惑，工业停滞，物质匮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国往何处去？

一个熟知国情深谙民心的小个儿政治家，当仁不让地走到政坛前台，川音铿锵向世人展示他所设计的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宏伟蓝图。

舍此，中国已别无选择。

十多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一下就被推到命运转折的大弯道上。改革开放迅速成为一种共识，整个民族都卷入了这汹涌的变革大潮中。而广泛的全民参与，加速了民族经济的腾飞和观念的更新。这是个成功的机会按几何级数增长的社会转型时期，时代公正地审视每个人的社会价值，为必然也为偶然创造机遇。它的序幕一经拉开，一大批从未见经传的小人物，便摩肩接踵地步入时代的新闻橱窗，成为改革初期明

星式的人物。

其中有个从安徽芜湖市社会底层冒出来的以炒瓜子为业的小贩，居然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凭一把锅铲炒出了百万之资，一跃成了中国最大的个体经营者之一，并推动了全国瓜子行业的发展。

这个绰号傻子的年广九，名字频频出现在报纸刊物上；他那张骨骼嶙峋的瘦脸，不时闪现在屏幕和画报上。而他那近乎神话的发迹史，也很快被编撰成“传奇”，被搬上话剧舞台。只几年里，他便拥有了连自己也不敢相信的与他社会地位极不相称的广泛社会影响。从中国的普通百姓上溯到党中央总书记，很少有人不知道他。甚至连港澳富豪、日本客商们也都知晓芜湖有个叫傻子的瓜子大王。有几拨日本客商到中国洽谈贸易时，专程弯道芜湖拜访他。

1991年，在深圳国贸大厦四十三层旋转大厅上，那位叱咤风云的小个伟人，用他富有韵味的四川口音讲了如下一席话：

“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这席话，在再度鼓

荡起中国改革大潮的同时，也于无意间决定了一个小人物的命运。

然而，这个人似乎生来就是个“！”和“？”的复合组合体，给人们带来欣喜和感奋的同时，也带来许多困惑和忧虑。人们评说他的功过是非，传播他的秘事轶闻，街谈巷议，沸沸扬扬。只是有的将他虚幻了，神秘得近乎离奇；有的将他扭曲了，畸形得如同怪物。

人布的迷阵，总得由人去打破。

十年来，我曾七下芜湖，奔波于那座皖南江城的大街小巷，追踪采访傻子，思辨因他而发生的一切。同时，我目睹了这个全国最知名的个体经营者和他的著名商品“傻子瓜子”盛衰的全过程。

因而，本文将给读者们讲述的是傻子其人，以及这个傻子怎样把原本该是一阕赞美诗的“傻子瓜子”，唱成了一曲挽歌。

A 章 芜湖有个“傻子”

作者：噢，你就是瓜子大王。

年广九：瓜子大王我不敢吹，我敢称水果大王。做水果生意（他将胸肋拍得嘭嘭响），我百战百胜。

作者：可是瓜子才是你的商品。（噙着傻子瓜子）年老板，你这瓜子怎么就炒得这么好吃呢？

年广九：哎，这就是技术，我研究十年了，不能跟你讲。你帮我讲出去不得了。我做什么生意都跟别人不一样。你多尝尝。

作者：不行，我怕吃多了上火。

年广九：你外行，我的瓜子有滋养。

栖惶的小贩

世上偏偏就有这么些阴错阳差的怪事。

年广九早先不是炒瓜子的，他九岁时就被父亲送到水果店去当学徒。芜湖解放后不久，他父亲故世了，年广九便接

过水果摊，继续干着水果小贩的营生。从此，他前前后后盘弄了有十多年的水果。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日后却是炒瓜子炒出了名。

但至今他仍是以精通水果生意为荣的。

年广九独立出摊卖水果那年才十四岁。他虽小小年纪，且又一字不识，却脑筋活络，谙熟水果特性，并秉承了北方农民吃苦耐劳的韧劲。因此，一出摊他生意就做得挺顺手。

入冬时节，果品公司批发给的香蕉，小贩们都不敢要。香蕉“香娇”，虽香却娇。天冷一冻，几百斤香蕉烂起来跟冰融雪化似的，老天爷也帮不了你忙。可年广九敢要。他把香蕉用板车拉回去窖起来，不辞辛苦地每天跳进去翻晾两遍。待等到大雪纷飞时，他的香蕉出窖了。他顶着北风头摆下摊子，码起一堆堆灿然耀眼的金黄，一阵阵扑鼻沁心的醇香，满大街找不到第二家，任他要价。

年广九说：那年头的小贩们一个个贼精，被逼的。

当时，国家工商管理法规定：小贩的水果价格，一律不得高于国营商店。为了卖出个好价钱，年广九就避开国营商店的营业时间。晚上七点钟，国营商店关门打烊时，年广九点起马灯出摊，到车站、码头兜揽生意。等到早上八点钟商店开门时，他就收摊不干了。

小贩本微利薄。年广九起早贪黑地忙活，日子还是过得紧紧巴巴的。

这年夏天，他邀了几个穷哥儿们当帮手，直接到产地贩运水果到芜湖来卖。这是年广九互助性劳动组合和直接沟通产销渠道的最早尝试。这次尝试相当的成功，几个人一夏天就赚了上千元钱。

然而，他多舛的命运也就从这时开始了。公安部门以新型雇工剥削、挖社会主义墙角的投机倒把分子罪名将他逮捕，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

重提那个荒诞的年代，总让人有种惨淡的压抑感。可是，为了认识和理解今天，我们又不得不勇敢地承受起自我折磨的苦痛，将思绪的快车挂上倒档。

年广九乖乖地蹲了八个月的班房，被提前释放了。他出狱没多久就赶上“文化大革命”。这时的芜湖，所有商贩合作小组都已划归街道委员会管理，年广九被编入一个搬运大队。实际上这是用行政手段，强行将个体经济纳入到集体经济中，由多劳多得改为拿固定工资。年广九的月工资为四十元。这点钱加上妻子在街道工厂裁玻璃挣的二十多块，实在糊不住一家六张嘴。

生性不肯安分的年广九退组单干，重操小贩旧业。

然而，那场政治运动早为小商贩们预备下了一个死对头：革命委员会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简称“打办”）。

在“打办”的法力面前，年广九活像童话里的那个坐船船漏，过桥桥断的倒霉蛋：卖冰棒，冰棒被扣留；卖板栗，板栗被罚款；卖甘蔗，甘蔗被没收……

小贩小贩，要活命就得贩。反正他年广九也给“打办”打成个老油条了。那年秋天，他花了三十二块钱（其中有十七元是水果合作小组的那帮穷哥儿们每人几块帮着凑的，后来年广九分三次还清了这笔债），买了一辆除了铃儿不响，其它哪儿都响的旧自行车。他在车后座上插了只柳条筐，裤腰带里藏掖着二十块本钱，便去十几里路外的清水镇贩起鱼来。他浑身腥味地颠簸在那条坎坷不平的砂石公路上，每天能赚个

三四块钱。

那时工商管理部门对个体经营范围规定的几十个“不准”里，有一条只有鱼贩子们才懂的“不准”：不准卖开刀鱼。即每条半斤以上的，需要用刀剖腹掏脏的鱼。大约是年广九那天贩的鱼超过了半斤一条，早市上刚脱手二十来斤，就叫“打办”给逮住了。

十二年后，我在芜湖市工商管理局的档案室翻阅了当年的处理记录——

承办人意见：该人退组单干，长途贩运，情节较严重，但生活确实有困难。经共同研究：自行车没收，现金三十一元九角交街道，教育后发还本人。

工商所意见：同意承办人意见。

工商局意见：经研究，年广九投机倒把是一贯的，应从严肃处理，自行车和现款全部没收。

几年前，巴金老人曾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倘若真能如愿，这份对年广九的处理记录，绝对有被其收藏的价值，从中可以考证出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曾很严肃地发生过多少可笑的事情；可以看出极左政策是怎样异化了我们的政府公职人员，将这些社会公仆变成了欺凌者。

然而，反常多变的政治气候，却也磨练了小商贩们惊人的适应力。他们就像那些高耸在芜湖市区的赭山上的茅草，石缝间、崖坡上，有一撮黄土就能吐一蓬绿色，捧一丛生机。

1972年的冬天，年广九遇见了那个曾和他在一个组卖过几年水果的胡福如之后，便改行炒起瓜子来。

胡福如是皖南绩溪人，二十二岁上与表妹成亲。囿于贫困，婚后三天小两口就攥两双空拳，跑到芜湖闯荡生活。他先是给一家木炭厂记帐，日本人投降那年丢了差事，便去挑“八根线”（担子）卖蔬菜，一直挑到芜湖解放。

他这一生可谓多灾多难，了无宁日：少年丧父，青年丧母，中年丧妻。人生之大不幸全让他给撞上了。妻子给他留下三个女儿，大的十三，小的才五岁。胡福如又当老子又当娘地苦熬了三年，这才又续上了现在的老伴。老伴进他胡家门时，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家徒四壁，境况窘极。胡福如每天做生意赚的那点钱，买不了五斤胡萝卜缨子。望着—锅清水煮出的烂菜叶和三个站在锅边咬指头的羸弱的孩子，老伴心疼得直掉泪，一狠心跑到医院去卖血……

胡福如苦了一辈子，卖过菜，捣腾过水果，贩卖过鸡鸭，最后炒起了瓜子。可他没一桩生意能做得安稳，成天被“打办”的人撵得东躲西藏，狼狈万状。他常常可怜巴巴地望着不远处的那座饭箩山，想着那个古老的传说——

很久以前，山下住着个老渔夫。有一天，他从江里网捞起一只黄盆。无意中发现只要往盆里丢进七粒米，就能煮出满满一箩饭来。老渔夫这才知道原来它是只金宝盆。是时芜湖正逢水灾，饥民如蚁，饿殍遍野。善良的老渔夫就用这只金宝盆，煮出一箩箩白晃晃的大米饭赈济灾民。

于是，山便由此得名饭箩山。

多动人的故事啊，可它为什么只是个传说呢？胡福如想，我要是有口饭吃，何至于这大把年纪还让人赶来撵去的。

有一天，他刚在巷口支起瓜子摊，“打办”的人就像闻着了味儿似地围猎过来，十几斤瓜子被连匾端走了。他回到家

正在那儿生闷气，年广九进来了，问：“胡师傅，怎么不去卖瓜子？”

“日他个妈的，不炒了。”

“你不炒让我来炒。”

“你去炒好了。”胡福如连锅带铲子都给了他，并告诉他炒制程序，如何掌握火候和味道的咸淡。

从此，年广九便开始了他的瓜子生涯。

炒出与众不同的货色

实在地说，考证这个问题原本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在我采访过程中，除了胡福如老先生，还有四个人自称是年广九的师傅。

这就引起我兴趣了。

我问年广九：“到底谁是你的师傅，是胡福如？”

或许当初胡福如传授的炒制技术过于简单，或许眼下胡福如正是他威胁最大的竞争对手，年广九摇摇头：“我俩炒出的瓜子味道不同么，他不是我师傅。我师傅是个老头儿。”

这话不具有充足理由。味道不同，可以是后期改进的结果。而且，他认定的师傅——那个“老头儿”永远不能为他作证——

那个连年广九也记不起姓氏的“老头儿”，也是个贫寒至极的小贩世家。他家有老妻弱女，床上还躺着个瘫痪的儿子。为了养家糊口，“老头儿”六十好几岁的人了，还不得不强撑

病歪歪的身子，白天气喘吁吁地炒瓜子，夜幕时拎着瓜子篮躲闪在几家电影院门口兜售。

有一天晚上，他缩头缩脑地蹑到大众电影院门前时，突然发现两个戴红袖箍的“打办”，直冲他这边走过来，惊恐地拔腿就跑。跑到工人菜馆台阶边，他便已气喘不迭，两腿发软，一跤绊倒在地，摔了个脑溢血。他没来得及说完：“我再也不……用躲躲藏……”就撒手人世。

死，对这个活得累人的“老头儿”，实在是一种轻松的解脱。

我不得不承认，直到最后离开芜湖，我也没能揭开谁是年广九师傅这个谜。谜就谜吧，生活中的谜还少吗？世上再多一个年广九师傅之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炒出了风味独特的瓜子，这具有无可非议的创造性。

年广九刚开始炒瓜子那会儿，芜湖瓜子行业一片萧条。国营商店出售的瓜子苦咸苦咸，一些小贩偷偷摸摸炒出的瓜子也质量平平，基本上无技术可言。可是芜湖人喜欢嗑瓜子，即使是这种咸渍渍的玩艺，仍成包论斤地往回买。年广九这个生意场上的老手，以他殊于一般小贩的眼力，看出了这个行当的远景。他在心里悄悄琢磨着：如果真的靠炒瓜子为生，就非得炒出与众不同的货色来。

当时“文化大革命”正乱哄着，只要他不倒腾买卖，也就没人管他。这就给了他自由选择生存方式的机会。

他很有心计地尝遍了芜湖各家瓜子，然后背上只旧挎包钻进“东方红”轮的大通舱，溯江而上奔九江、武汉；顺水而下去南京、上海，了解外地瓜子行情，将各种瓜子都买上

一小包。回到家里，他将搜集来的各地瓜子摊了一桌子，手把一杯清水，挨个品咂它们的不同滋味。每品咂过一种，就用清水漱漱口，喃喃地自说自道着：“唔，这个太咸了，吃多肯定糟心……这又太甜，腻人。噢，这种瓜子还有点吃头，就是味道单调了些……”

他问自己：炒瓜子就不能跟炒菜一样，多放它几味佐料吗？

这一问使他悟出窍门来了：要想让瓜子炒得有味又好嗑，一是要把握配料，二是要掌握好火候。他边炒边摸索，每炒出一锅就揣起几包上街，悄悄拦住过往的行人，哈腰赔笑：“老大爷帮帮忙，尝尝这瓜子炒得怎么样？”

北方人说应该再咸点儿；南方人说最好再甜点儿；陕西人说不能一嗑就碎；福建人说要出点鲜味……

年广九博采众议，反复改进；精制配料，大锅小炒。

终于有一天，几个路人尝了他的瓜子后，惊讶地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乖乖，真是打肿了嘴巴子也不肯松口的货。

如今，年广九已说不清这个对他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是哪一天了，只记得那会儿刚入秋，他还穿件破单褂。

可那个季节是个好兆头，它意味着收获。

年广九成功地炒制出了风味独特的奶油香型瓜子：甜中含香，咸里透鲜，一嗑三瓣，乳味绕口。这时，他才不声不响地在市中心的十九道门巷口摊点上，悄悄亮出了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傻子瓜子。

为什么要叫“傻子瓜子”？

若干年后年广九出名了，有不少人都曾考证过“傻子”的

出处。有的推理：年广九卖瓜子生意公道，缺一补十，所以人们叫他傻子。有的结论：芜湖人称长江以北的人为侉子；年广九是淮北人的后裔，因而人们叫他侉子。但念错了音，把“侉子”叫成了“傻子”。

都没说对。

“傻子”是年家沿袭了三代的绰号。

年广九的父亲是那年淮河发大水逃荒到芜湖，靠贩卖水果谋生的淮北农民。这个被苦难压弯了腰的北方汉子，衣衫褴褛，举止发拙，神情木讷得近乎愚钝。他样儿傻，做买卖也憨，从不让顾客短斤少两，也不和小贩们争个摊位、品种什么的。水果行的老板批发给他多少就多少，不论好坏，也不还价。每天赚的只要够一家三口填饱肚子，他就收摊了。小贩们都好笑：“哪有这号做买卖的，真是个傻子。”

傻子傻子地叫顺溜了，跟他一起卖了十几年水果的小贩们，如今竟没有一个人能想起他的名字。

傻子穷得连耗子都不肯在他家过夜，却有个洁癖：每天傍晚收了摊回来，靠住了要花上五分钱，到市中心的大观园浴室洗个最便宜的澡，在荡漾着一池浆汤似的浑水里泡上个把小时。然后回到家，就着一小碟花生米捏起了小酒盅，边喝边哼着“小倒七”，醉微微的眸子里闪着快活之光。有时喝着喝着，他会突然跳起来，扯着劣质酒烧哑的嗓子，傻里傻气地满巷子嚷：“小九子啊，小九子，你还不给我快滚回来……”

有老人说小九子是傻子唯一不曾夭折的第九个孩子。也有老人说是他的独根苗，在半醉犹醒中他给刚出世的儿子，按年家家谱“广”字辈，取了个“酒”字为名。或许后来为方